

我命由我不由天？當代弱勢青少年社會生態 復原力保護因子之建構

白倩如^{1*}、曾華源²

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²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健康照顧與社會工作系講座教授

不瞭解當事人生命歷程發生當下的公共體制，就無法充分理解那個人的人生。

The life of an individual cannot be adequately understood without references to the institutions within which his biography is enacted.

—C. W. Mills

一、前言

弱勢青少年成長過程面臨各種挑戰與風險。過去，專業助人系統對弱勢青少年偏差行為之解釋，傾向採取病理觀點（pathological perspective）與個人歸因論；主要關注偏差行為發生導因之探析，介入焦點多聚焦在個人認知情緒與壓力調適能力，其背後隱含之假設是認為個人具有改變負面認知情緒與生命發展路徑的自主性。然而，Ungar（2004）認為病理觀點其實是責備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偏見意識形態；不僅忽視個人成長於被剝奪的環境，同時也低估社會結構和社會政策對弱勢青少年的消權（disempowerment）與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 Ridge, 2002）。病理觀點盛行於經濟蓬勃發展的全球化初期，

投稿日期：2022/04/26；接受日期：2022/04/28

* 通訊作者：白倩如

Email: rubywhite@cc.ncue.edu.tw

新興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帶來階級更為自由流動的希望，社會普遍認為只要「甘願做牛，毋驚無犁通拖」。然而，這樣的論點對當代弱勢青少年適用嗎？本文首先從當代弱勢青少年的生態處境，探討其所面對的生存發展之結構性限制；其次，說明社會生態復原力（social ecology of resilience）之理論沿革，如何從個人特質論轉向環境保護論；最後，探討社會生態復原力之多層級系統之保護因子與實務介入原則。

二、寒門再難出貴子？當代弱勢青少年之生存逆境

人的成長過程中，個人內在生理條件與心理素質是發展基礎，但環境因素卻是影響個人長期發展的關鍵因素。從生態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來看，個人能否適應良好並獲得發展，是個人與所處社會環境結構互動的結果。人與環境是一個統合系統（unitary system），彼此相互影響（Greene & Greene, 2009）。也可以說，個人的生命軌跡是與其身處的微視（micro-）、中介（mezzo-）、鉅視（macro-）場域（settings）持續性、雙向性與互惠性的動態作用結果（鄭麗珍，2021）。過去，在探討弱勢青少年議題時，大多聚焦在家庭功能與社會資源缺乏，及其學習表現低落、低生涯期許與成就抱負、低自尊、曝險與偏差行為等等，而常用「叛逆」、品行不佳、偏差、高危機等詞語形容之（Dryfoos, 1990; Wigtil, 1995）。國內青少年政策資源也主要是投入在拒學、輟學、成癮、過早的性行為、性剝削、自傷、自殺、情緒障礙、涉入司法案件等等問題行為之矯治輔導上。承襲病理觀點認為人可以努力改變或選擇要做和不做什麼的自主思維，實務處置聚焦在扭轉青少年個人「偏差」的認知與情緒反應（Wolin & Wolin, 1993）。

然而，自20世紀末全球化浪潮與網路平臺興起後，傳統家庭與兒少的「理想」圖像開始受到挑戰。當代青少年面對的經濟、政治、性別、階級、貧窮、種族與家庭生活問題，均與過去任何一個時代有根本性之差異。全球化下各國青少年的不平等梯度，正在持續拉大和惡化之中（Prout, 2004）。事實上，當代社會流動程度可能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有限，絕大多數人其實是維持與上一代相同的階級地位；底層家庭兒少面臨比上一代更多的生活風險，「翻身」的難度更高。臺灣因產業升級造成技術與非技術工人薪資所得差距擴大，加之全球化造成獲益集中在少數資方與技術管理高層，致使社會階級所得不平等持續拉大（林宗弘，2015）。高等教育升學制度改革，又進一步惡化階級複製與階級固化。國內外研究均顯示，不同社會經濟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的家

長有截然不同的教養行為與教養資本（藍佩嘉，2019；Lareau, 2011; Doepke & Zilibotti, 2019）。

臺灣勞工階級家長的挑戰主要是其必須面對日益艱困就業勞動條件壓縮，致使其陪伴子女的時間變得相當奢侈，諸如缺乏時間陪伴子女從事多元活動、完成作業、理解複雜升學制度與價值引導，他們往往需要花更多時間工作，為孩子購買額外的補充教育，以彌補落差（藍佩嘉，2019）。當父母沒有高學歷或從事庶務性、勞力性工作時，常忙得不易抽出時間教養子女，如果面臨重大疾病、意外事件、因故欠債或關係衝突離婚，則將為子女生活與發展機會帶來更多挑戰。原本期待透過多元教育升學改革使「寒門子弟」有翻身的可能性，但事實卻是家戶所得資產越高者，其子女就讀國立明星大學的比例越高；而政府提供不同學制的教育經費補貼，又進一步惡化教育資源的反向重分配現象（沈暉智、林明仁，2019）。基於病理觀點的社會安全網與脆弱家庭等社會福利政策，對家長來說普遍是感覺受到監管和表面關懷多於實質教養支持（白倩如、曾華源，2022；藍佩嘉，2019）。

三、超越個人歸因——社會生態復原力之意涵

復原力理論起源於Werner 與 Smith（1982, 2001）於1950年代在夏威夷對出生弱勢家庭的698名嬰兒，進行長達60年的縱貫研究；他們發現有近三分之一的弱勢兒童少年在成年後表現出對抗逆境的正向發展結果，其在生活中均有使其足以避免陷入負面發展結果的保護因子（protective factor）。其後，Garmezy（1983）與Rutter（1987）進一步確認保護因子對復原力形成的動態歷程與保護機制。Luthar et al.（2000）將復原力定義為「在重大逆境脈絡環境中達成正向適應的動態性歷程」（p. 543）。然而，復原力究竟是一個實用的概念還是可能落入套套邏輯（tautology）的事後解釋，仍然有爭論。此外，復原力究竟是個人的認知能力與心理特質，或是由個人與環境保護因子互動促發，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

Brooks 與 Goldstein（2003）即是特質論者，其主張復原力是個人具有同理心、有良好的溝通與問題解決能力、對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知道如何增加抗壓性，並且感覺自己是獨特、有價值的。Walsh（2006）較偏向認為復原力是能與環境積極互動，是面對風險或挑戰的成長過程，也可說是風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交互作用。Masten（2014）認為兒童復原力的科學研究應是跨學科的，結合系統理論與發展理論觀察其生命軌跡，找出能夠成功適應威脅系統之功能，

以及促進生存之能力或阻礙發展之能力為何；亦即復原力為系統間動態交互作用形成。Benard (1991) 亦認為，人都有特定能力應對環境各種不同壓力，故對抗逆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Henley (2010) 也主張復原力是一個動態性的適應過程，亦即個人復原力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來因應壓力與情境。其後，環境系統對復原力形成的論點受到更多支持。Yehuda et al. (2006) 認為有復原力者是因為擁有更好的支持系統、生活機會、基因，以及能與許多其他非基因因素產生正向結果的相互作用。Panter-Brick 與 Leckman (2013) 則採取綜合性觀點，認為復原力是個人能利用資源來維持幸福的過程；其中「利用資源」既是個人的屬性，也是能力展現的過程和結果。

近年來，復原力研究朝向三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其一是聚焦在個體層次的神經生理學與遺傳因子研究，聚焦在預測不同環境壓力程度下，兒童可能被觸發的正向或負向反應。其二是聚焦在優勢、內在與外在資本、個人資源與社會資源，以解釋上述因素在正向發展的中介作用。普遍共識是，當個人有越多保護因子與越少的風險因子 (risk factor)，則有越高的復原力 (Pollard et al., 1999)。其三則是側重於文化差異與更廣泛的生態因子 (如影響兒童少年成長的物理環境健康度)，探究其在復原結果產生的差異性 (Ungar, 2008)。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研究取向均一致強調生態環境對兒童少年成長的重要性，且均主張應建立更友善的生物—心理—社會與多元文化環境。這也回應了Beckett et al. (2006) 與Sroufe et al. (2005) 的研究發現，以兒童為中心的發展理論與實務介入，在兒童正向發展結果的有限性。

Ungar (2011) 主張應將復原力促發的關注焦點轉移到兒童少年的社會生活環境系統，而非個人特質上；其提出社會生態復原力是「在面臨重大逆境時，復原力既是使個人朝向足以維持心理、社會、文化與物質資源幸福的能力 (capacity)，也是指具有和個人的、集體的資源協商的能力，且資源使用的經驗必須是以符合文化意義之方式提供」 (Ungar, 2008, p. 225)。據此，Ungar (2011) 融合生態觀點與Kurt Lewin的場域論，提出社會生態復原力的概念表達公式 (圖1)；亦即復原力之正向表現行為 (R_B) 是個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之結果 ($f(Psc, E)$)，而發展軌跡之差異，則是取決於是建立在資源的可得性 (O_{AV}) 與可近性 (O_{AC})，以及個人生活環境中給予不同資源賦予之文化意義 (M) 的交互作用基礎之上。

圖1
社會生態復原力之表達式

$$R_{B(1,2,3\dots)} = \frac{f(P_{SC}, E)}{(O_{Av}, O_{Ac})(M)}$$

資料來源：“The Social Ecology of Resilience: Addressing Contextual and Cultural Ambiguity of A Nascent Construct,” by M. Ungar, 2011,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1(1), p.12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2010.01067.x>).

四、從「認命」到「韌命」——弱勢青少年之社會生態復原力保護因子

保護因子是指能減緩、調節或修補風險，並能預測未來正向發展結果之要素（Rutter, 1987）。有關弱勢青少年復原力保護因子的實證研究很多。Werner 與 Smith（1982, 1992, 2001）的研究具體指出，弱勢青少年的復原力保護因子有四類：（一）良好的同輩友誼關係、擁有與家庭親戚的健康依附關係；（二）與無親屬關係成人（如教師、教練、管理者等）的健康依附關係；（三）積極參與各種利他性的社區活動等，以及（四）利社會活動，亦即要能透過利他活動發展出自信和他人關懷。Henley（2010）則歸納出四個核心保護因子：（一）與重要成人之正向依附關係，亦即要與父母或其他親密家庭成員建立溫暖、健康的成人依附關係或至少要與一個無親屬關係的成人有此等關係；（二）與同儕之間健康的依附關係，是指有能夠信任所交往的朋友和同事，以利獲得多元的互惠交換關係的機會，包括提供相互鼓勵和情緒支持、給予適當行為的務實回饋；（三）社區參與利社會行為，是指通過參與正式及非正式活動、組織或機構與社區系統組織互動，以提供個人投資公共善行（common goods）的機會；（四）問題解決技巧，是指上述的社會關係能協助個人發展多樣的問題解決技巧，促進個人執行功能性的因應與適應策略。上述研究結果均顯示，與家人、同儕、無親屬關係的成人之間健康的，以及利社會的社會參與社會資本建構等有意義的支持關係，有助於形塑個人正向心理，而利社會行為的社會參與，則有助於培育自我效能和問題解決能力（白倩如等人，2014）。上述因素也能協助個人建構在生態棲息地的社會支持網絡，有助於個人於生態系統中能與環境成功交流。

就社會生態復原力而論，弱勢青少年復原力培育必須修正環境中各種制度與社會文化因素對其形成的隱性阻礙，並積極在微視、中介和鉅視層級系統強化保護因子。Furlong et al. (2006) 即指出，青少年是從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中所接觸的人事物形成其生活與自我信念，故修正弱勢青少年的機會結構 (opportunity structures)，才是使其朝向正向發展之主要因素。若復原力是個人與生態系統交流的過程，則必須要通過規劃其生活環境的各種互動機會，獲得經驗和社會資源的支持，以培育弱勢青少年復原力 (Fraser et al., 1999; Theron & Theron, 2010; Walsh, 2006)。也就是說，復原力是需要賦權 (empower) 弱勢青少年。在剝奪性環境下的壓迫下，弱勢青少年似乎逐漸學會「認命」，有些人則採取更為消極作為自保，而有些人則會採取對抗的態度和行為，甚至是表現出反社會行為。

必須注意的是，保護因子作用的發揮需要透過專業人員有意識的促發。Benard (1991) 即強調復原力的培養是在互動、信仰、參與機會和權力等關係層面不斷的相互交流影響培育而來，環境中的關懷關係必須是以傾聽、安全和信任為基礎，傳達同情、理解、尊重和興趣。此一觀點與白倩如 (2012) 針對安置機構青少年的行動研究發現是一致的。也可以說，方案執行過程提供何種學習經驗感受，比方案採取何種活動更為重要。從社區諮商與社會工作者的實務介入來看，專業助人者應積極建構保護因子，透過支持性的關係，促成個人在各環境系統中，發展具效能的社會角色與相應的角色能力 (Moritsugu et al., 1995/2019)，使其足以應對生活中的壓力和挑戰，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總括來說，培育弱勢青少年復原力要重視建構正向環境生態的影響力，專業助人者可在以下三個層級系統的干預焦點進行著力。

(一) 環境制度層級——敏察政策制度的結構性與過程性壓迫議題與倡議改革

Young (1990) 指出，專業助人者必須對社會制度和過程進行批判性檢視，以理解壓迫和權力運作的模式如何對個人產生影響。社會正義不僅是資源分配議題，更需要關注壓迫的系統性社會制度與過程，如何對個人形成影響和結構性限制。如果無視家庭功能與社會階層差異，將是對青少年學習歷程的制度性壓迫；諸如升學制度 (多元學習歷程檔案) 對弱勢青少年帶來的壓迫與不公、教師對弱勢青少年學習困難如何歸因與協助，以及多元課綱對無法補習的學生產生的限制等等 (劉正, 2006)。教育體系的輔導人員提供社區諮商服務時，一方面應積極倡導制度的不公平性和風險性 (沈慶鴻、趙祥和, 2021)，另一

方面應結合社會資源，專門針對弱勢青少年學業學習和升學需要，舉辦各項發展性和社會參與服務活動，以充實學習歷程檔案，並提升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此外，應反思和反身現有福利政策的消極性措施所隱含的不公，倡議研擬強化弱勢家庭政策目標與措施，以提升家庭親子正向關係和教養功能，並提供家庭成員社會參與性的資源與機會，建構社會發展的網絡和社會連結。

（二）社區層級——積極建構可及之社會參與機會促進社會互惠性連結

社會參與與社會連結是提供培育復原力的重要媒介，諸如志願服務、社會組織、休閒育樂社團等等資源，均受限於生活區域差異而使弱勢青少年資源的可近性和可得性不足。Höltge et al. (2021) 的研究指出，弱勢青少年要能在逆境中有社會適應與發展能力，有賴建構能相互連結的支持系統網絡；結構性的遊樂與非正式的學校活動，是重要的保護性因子，能提供安全、穩定和可預測的環境，使其能發展更佳的能力和自尊感，而敢於構築自己對未來的生活期待與希望感。弱勢青少年的自我價值感和社會認知內涵來自生活經驗，可透過參與社會組織以建構社會資本之外，亦可以透過參與和主導規劃各種活動，學習發現和解決問題，以及與團隊成員合作能力，並發展興趣和休閒專長，擴大生活棲息地的資源，以便獲取社會支持，強化個人自我效能，培育個人正向行為和心理。

（三）家庭與個人層級——支持家庭與青少年獲得正向支持性關係之經驗

過去專業服務常針對提升弱勢家庭在內部能有適應力，但忽視弱勢家庭外部不利環境並未改變的根本問題。培育弱勢青少年復原力的過程中，如果不能配搭增加環境系統的保護因子，將可能維持或增加弱勢家庭的風險處境。因此，如何發展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模式，成為當前專業助人者的重要課程。其實華人家庭內部系統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強，對缺乏資源的家庭只做負向評估，無法真正協助脫離家庭不利處境。弱勢家庭本身即是資源缺乏，除了培育能建構正向關係，以及積極期待子女發展性生涯的親職教養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強化提供家庭外部環境各種發展性機會，才能有效協助弱勢青少年養成對抗逆境之正向心理和勝任能力，逐漸脫離被剝奪的生態環境。此外，弱勢青少年生活環境中的成人是社會學習榜樣，正向支持性則是個人自我價值感的重要來源。專業助人者應支持弱勢家庭父母與子女發展正向支持性關係，發展親職效能，鼓勵重視子女的學業表現、學習態度與價值引導，並學習如何理解子女的學習需要，以及用不帶負面情緒的攻擊語言和態度表達期望與關愛，提供價值

引導。研究指出當父母無法提供安全性親密的依附關係時，非親屬的成人扮演導師（mentor），具有積極的支持功能（白倩如等人，2014；Werner & Smith, 2001）。因此，助人者和教師反思自己是否是弱勢青少年人生導師？在個人層面上，個人透過參與各種方案性服務，獲得積極性和建設性生活經驗，以培育自我效能、解決問題能力、改善課業學習（徐慧芝，2014），並從成功經驗建構自己正當的社會價值、品德與發展生涯目標。這些都可以是各種正向服務活動方案的目標和結果。

五、結語

其實弱勢青少年處於長期慢性逆境中，面臨生態環境系統的多重壓迫性風險因子（白倩如等人，2014；Ungar, 2010）。專業助人者應該體認復原力的核心哲學思維—不利事件肯定是痛苦和困難的，但它們不必決定你生活的結果。以病理因素為焦點的服務是偏向處理風險因子，較少關注如何使弱勢青少年發揮自身優點，擴增保護因子，以對抗生活逆境。過去在這種「給抗生素治病」而非「增進免疫能力」的思維下，個人優勢或潛能將不斷被壓抑，最終將使人無力對抗外來的壓力和挑戰。不過，身處不同逆境樣態的青少年，其所需保護因子的組成可能各有不同；例如對於長期處在惡劣環境中的青少年來說，其問題解決能力不一定不好，但其缺乏對未來的希望，其自我實現預言是非常強的，故激發弱勢青少年的希望感與信心成為必要的目標。跨學科、跨專業合作進行本土性研究與實驗方案，累積有效保護因子之證據，方是專業助人體系培育下個世代弱勢青少年復原力之必要任務。

參考文獻

- 白倩如（2012）。機構安置少女復原力培育之行動研究。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5**，103-155。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12.25.03
- 白倩如、李仰慈、曾華源（2014）。復原力任務中心社會工作：理論與技術。洪葉文化。
- 白倩如、曾華源（2022）。社工可以做更多一點嗎？脆弱家庭家長服務使用經驗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78**。
- 沈暉智、林明仁（2019）。論家戶所得與資產對子女教育之影響——以1993-1995出生世代及其父母稅務資料為例。經濟論文叢刊，**47**（3），393-453。https://doi.org/10.6277/TER.201909_47(3).0003
- 沈慶鴻、趙祥和（2021）。社區諮商：社會正義與系統合作取向。心理。
- 林宗弘（2015）。臺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45-68。
- 徐慧芝（2014）。「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方案」系統角色之探析：生態系統理論觀點。教育行政論壇，**6**（2），90-109。
- 劉正（2006）。補習在臺灣的變遷、效能與階層化。教育研究集刊，**52**（4），1-33。https://doi.org/10.6910/BER.200612_(52-4).0001
- 鄭麗珍（2021）。生態觀點。載於宋麗玉、曾華源、施教裕、鄭麗珍，社會工作理論——處遇模式與案例分析（第五版，頁277-304）。洪葉文化。
- 藍佩嘉（2019）。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春山。
- Beckett, C., Maughan, B., Rutter, M., Castle, J., Colvert, E., Groothues, C., Kreppner, J., Stevens, S., O'connor, T. G., & Sonuga-Barke, E. J. S. (2006). Do the effects of early severe deprivation on cognition persist into early adolescence? Findings from the English and Romanian adoptees study. *Child Development*, *77*(3), 696-711. https://doi.org/10.1111/j.1467-8624.2006.00898.x
- Benard, B. (1991). *Fostering resiliency in kids: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Northwest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
- Brooks, R. B., & Goldstein, S. (2003). *The power of resilience: Achieving balance, confidence, and personal strength in your life*. Contemporary Books.
- Doepke, M., & Zilibotti, F. (2019). *Love, money, & parenting: How economics explains the way we raise our kid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ryfoos, J. G. (1990). *Adolescents at risk: Prevalence and preven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aser, M. W., Galinsky, M. J., & Richman, J. M. (1999). Risk, protection, and resilience: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Research, 23*(3), 131-143. <https://doi.org/10.1093/swr/23.3.131>
- Furlong, J., Whitty, G., Whiting, C., Miles, S., Barton, L., & Barrett, E. (2006). Redefining partnership: Revolution or reform in initial teacher education? In D. Hartley & M. Whitehead (Eds.), *Teacher education: Major themes in education: Vol. 5. Globalisation, standards and teacher education* (pp. 255-273). Routledge.
- Garmezy, N. (1983). Stressors of childhood. In N. Garmezy & M. Rutter (Eds.), *Stress, coping, and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pp. 43-84). McGraw-Hill.
- Greene, R. R., & Greene, D. G. (2009).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disasters: Bridging micro- and macro-perspectives. *Journal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19*(8), 1010-1024. <https://doi.org/10.1080/10911350903126957>
- Henley, R. (2010). Resilience enhancing psychosocial programmes for youth in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Progres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10*(4), 295-307. <https://doi.org/10.1177/146499340901000403>
- Höltge, J., Theron, L., Cowden, R. G., Govender, K., Maximo, S. I., Carranza, J. S., Kapoor, B., Tomar, A., van Rensburg, A., Lu, S., Hu, H., Cavioni, V., Agliati, A., Grazzani, I., Smedema, Y., Kaur, G., Hurlington, K. G., Sanders, J., Munford, R., ... Ungar, M. (2021). A cross-country network analysis of adolescent resilience.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68*(3), 580-588. <https://doi.org/10.1016/j.jadohealth.2020.07.010>
- Lareau, A.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2nd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uthar, S.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164>
- Masten, A. S. (2014). Global perspectives on resilience in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 Development, 85*(1), 6-20. <https://doi.org/10.1111/cdev.12205>
- Moritsugu, J., Vera, E., Wong, F. Y., & Duffy, K. G. (2019)。社區心理學（王大維、張麗麗、陳品華、陸怡琮、邱珍琬、羅素貞、郭郡羽、洪菁惠譯）。心理。（原著出版於1995年）
- Panter-Brick, C., & Leckman, J. F. (2013). Editorial commentary: Resilience in child development—interconnected pathways to wellbeing.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

- ogy and Psychiatry*, 54(4), 333-336. <https://doi.org/10.1111/jcpp.12057>
- Pollard, J. A., Hawkins, J. D., & Arthur, M. W. (1999). Risk and protection: Are both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diverse behavioral outcomes in adolescence? *Social Work Research*, 23(3), 145-158. <https://doi.org/10.1093/swr/23.3.145>
- Prout, A. (2004). *The future of childhood: Towar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hildren*. RoutledgeFalmer.
- Ridge, T. (2002). *Childhood 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Policy Press.
- Rutter, M. (1987).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57(3), 316-331.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1987.tb03541.x>
- Sroufe, L. A., Egeland, B., Carlson, E. A., & Collins, W. A. (2005).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 The Minnesota study of risk and adaptatio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Guilford Press.
- Theron, L. C., & Theron, A. M. C. (2010). A critical review of studies of south African youth resilience, 1990-2008.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cience*, 106(7/8), 252. <https://doi.org/10.4102/sajs.v106i7/8.252>
- Ungar, M. (2004). A constructionist discourse on resilience: Multiple contexts, multiple realities among at-risk children and youth. *Youth & Society*, 35(3), 341-365. <https://doi.org/10.1177/0044118X03257030>
- Ungar, M. (2008). Resilience across cultur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8(2), 218-235. <https://doi.org/10.1093/bjsw/bcl343>
- Ungar, M. (2010). Families as navigators and negotiators: Facilitating culturally and contextually specific expressions of resilience. *Family Process*, 49(3), 421-435. <https://doi.org/10.1111/j.1545-5300.2010.01331.x>
- Ungar, M. (2011). The social ecology of resilience: Addressing contextual and cultural ambiguity of a nascent construct.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1(1), 1-17. <https://doi.org/10.1111/j.1939-0025.2010.01067.x>
- Walsh, F. (2006).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2nd ed.). Guilford Press.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82). *Vulnerable but invincible: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silient children and youth*. McGraw-Hill.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92). *Overcoming the odds: High risk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rner, E. E., & Smith, R. S. (2001). *Journeys from childhood to midlife: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olin, S. J., & Wolin, S. (1993). *The resilient self: How survivors of troubled families rise above adversity*. Villard Books.
- Yehuda, R., Flory, J. D., Southwick, S., & Charney, D. S. (2006). Developing an agenda for translational studies of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following trauma exposur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071(1), 379-396. <https://doi.org/10.1196/annals.1364.028>
-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